

1931年,林铁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

1

历史纪实

宋国涛 著
人民日报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新中国成立以来,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,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。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;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、建设民主政权、开展土地革命;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,战胜艰难险阻,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。

本书介绍了彭真、黄敬、林铁、程子华、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(市、自治区)委书记的事迹,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,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。

河北省委书记 林铁

1949年1月31日,平津战役胜利结束,河北省全境解放。7月12日,中共河北省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保定召开,宣告中共河北省成立,林铁任省委书记。林铁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河北党委书记。

1928年,林铁在法国留学期间,受党组织委派,担任中共留法党委书记,以学生身份作为掩护,在留法学生及中国工人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

1931年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,当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,留法学生和中国工人群情激奋。林铁等人组织在法国的爱国侨胞和留学生,进行集会和游行示威,到日本驻法使馆递交抗议书,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。

林铁的行为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,受到严密监视。一次,林铁应邀出席法国赤色工会的全国工代会筹备会,研究华工问题。散会以后,他在地铁车站的台阶上被法国警察逮捕拘留,随即被驱逐出境。

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四处打听他的下落,想方设法进行营救,最终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,将他顺利接到苏联。

在苏联期间,林铁首先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,在这里,他与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、开国首任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成了同窗好友。

第二年秋天,林铁奉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,任中国部支部书记。在这里,他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,还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关于

武装斗争的理论和苏共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,这些学习成果都在他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派上了用场。

1935年冬天,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恣意践踏中国东北领土,并大举向华北推进,中国共产党率工农红军踏上漫漫征途北上抗日,林铁也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国。

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发生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鉴于冀东的重要战略地位,毛泽东两次作出重要指示,要在冀东建立根据地,进行游击战争。为实现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,刘少奇提出在冀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,任命林铁为省委军事部部长。

此时,冀东地区的党组织正在准备领导冀东群众举行反日大暴动,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,配合冀东暴动,林铁在天津举办军事训练班,把经过训练的骨干送到冀东一线。

1938年1月,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八路军115师官兵,挺进冀东大地。首先打下延庆县城。随后又进行了沙峪歼灭战,全歼日军士官教导队百余人,缴获大量武器装备。“没有枪、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……”就是当时冀东武装起义的真实写照。

1942年5月,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,出动坦克、汽车几百辆,凭借军事上的机动优势,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、空前野蛮的“五一扫荡”。到处搜捕抗日武装和抗日干部,搜捕抗日物资,疯狂屠杀抗日群众,制造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惨案。

在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下,林铁肩负使命来到冀中。

他首先为在反“五一扫荡”中

经受严峻考验、始终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广大干部、战士、民兵和群众颁发了“五一”奖章,并进行了大张旗鼓、热烈隆重的表彰活动,号召大家团结起来,克服困难,积极发展生产,为抗日多作贡献,极大地鼓舞了全区军民的斗争勇气。

为了尽快医治好日军野蛮大“扫荡”给冀中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,林铁和冀中区党委、冀中行署着力于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,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。在战斗的间隙,林铁带头开荒种地。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,全区军民一手拿枪,一手拿锄,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,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,改善了军民生活,也进一步增强了反攻作战能力。

1945年春夏之交,冀中军民对日伪军连续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攻战役,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,为全面消灭华北地区侵华日军以及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,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1949年1月31日,平津战役胜利结束,河北省全境解放。1949年7月12日,林铁任省委书记。

从1949年至1952年,林铁领导中共河北省委和全省人民,仅用不到3年的时间,就在全省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,建立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,实现了全省政令和财政经济的统一,把国民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。

1952年,毛泽东在南方视察之后,乘火车沿京广线北上。

途中,毛泽东说要在保定下车,陪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致电河北省委书记林铁,要求做好接待准备。

杨尚昆电报中所提出的接待事

宜,在现在看来都不成问题,但在当时来说,却成了难题。

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,在清代是直隶总督府驻地,因为保定离北京很近,旧时的总督、督军、省主席很少在这里住,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慢,甚至没有好一点的旅馆和饭店。

还有出行问题,当时河北省只有两辆卧车,一辆归省委书记林铁,另一辆归省政府主席杨秀峰。

林铁听完汇报后,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说:“把我的房子和车腾出来给主席用。”当时林铁只住着三间小平房,一间办公、一间睡觉、一间住秘书。

当天下午6时许,专列到达保定车站,毛泽东走下专列,与林铁等人一一握手。

林铁陪同毛泽东走进省委大院。当时,省委接待毛泽东最好的地方就是省委机关餐厅了。就让毛泽东等先在餐厅坐下稍事休息。餐厅所能容纳的人员有限,毛泽东在听取林铁简单汇报后就问:“保定有什么好玩的?”林铁回答说,保定地方不大,曹记花园和莲池公园算是最有名的了。

“走,去看看!”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来,边走边往外走去。

按照接待计划,毛泽东原定在林铁的房间休息,但考虑到毛泽东住在专列上安全更有保障,所以毛泽东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夜,次日返回北京。

毛泽东这次在保定时间不长,没吃、没住,水也没有喝一口,但对河北省和省委书记林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毛泽东曾开玩笑说:“河北富啊,有‘林’,又有‘铁’!”

香港沦陷让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

4

传奇人生

许燕吉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,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,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:不羨靓果枝头,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,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,也很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,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,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,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,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,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爸爸是个乐于助人的人,在香港时我们和陈寅恪、梁漱溟等人都十分相熟。

爸爸下葬后,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,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。追悼会开过,丧事就算办完了。治丧的朋友们还在发愁,这一大家子老的老、小的小,没有了经济来源怎么办得了!俗话说“救急不救贫”,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。妈妈叫周侯松,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,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。但那时暑假将结束,开学在即,各校师资已定。朋友们多方联系,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。虽说有点儿“大材小用”,但饥不择食,妈妈也就应聘了。总算“开”了“源”,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,就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,必须“节流”。

按说“节流”是我家的内部事,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、积极建议:一是搬家换小房子,二是减辞佣人,三是转学换校。

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,哥哥已入英皇书院,是公立的,学费有限,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。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,我二话没说,就去考了。虽说考试,类乎走走形式,但我也把题目都做了。回来的路上,有座红砖的小楼,哥哥说那里面有鬼,这我也没怕。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了,不能娇气,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。

袁妈、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,她们可以回北京去,不给妈妈增加负担。妈妈不忍,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,再说,小孩子没有了爸爸,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,感情上更受伤害。妈妈提出了一个办法,征求她俩的意见,即使她俩破涕为笑,表示一定尽心尽力,帮助妈妈共渡难关。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,办一个伙伙食的公寓。这样一来,袁

妈给人家做饭,刘妈打扫房间,给人家洗衣服,工资也挣出来了,房子也不用换了。

考了真光学校不久,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Miss Akens的信,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,免去我的学费,直到我毕业,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。妈妈说,这就不用转学了,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,留在圣司提反更好。英皇书院也来信,说免了哥哥的学费。还有一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,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。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很大的安慰。

开学后,我和哥哥上学,妈妈上班,袁妈、刘妈忙房客、忙家务,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、小猫,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。

不过,变化还是有的:汽车卖掉了,钢琴没卖,移到了饭厅,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。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。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,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。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,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,说说学校里孩子们的事,笑得挺开心,大家也都很开心;有时候就不然,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,她就会大哭一场。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工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,我都怕那石匠来。

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,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。有一天,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,我下课回家时,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,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了一个小缝,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,把花放在她的床头。

就这样,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。四个月后,香港沦

陷了。

那是1941年12月8日,星期一。早上,我提了书篮,哥哥背了书包,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。还没出院子,就听见天上有“嘭嘭”的声音。抬头一看,有几架飞机在飞,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,挺好看的。这时,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:“快回来!不上学了!”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,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,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,不是演习,真的打起仗来了。

上午,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,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。一袋是碎白米,两袋是玉米粒。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,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,哗啦啦地撒。刘妈过来说:“这是救命的粮食,不是玩意儿。幸亏你妈妈跑得快,抢到这几包,打起仗来,没吃的怎么办!”

爸爸死后,我似乎开了些窍,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。刘妈一说,我也就乖乖地走开了。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,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。可是,三包粮食够吃多久呢?袁妈、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,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,还得去寻找或试吃。婆婆是南方人,她肯定地说野苘蒿是可以吃的,于是第二天,她们三人提了一个大筐子上山,我也跟着。香港冬天草木不枯,野苘蒿好认,也多,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。晚上煮了一大锅,她们当饭,却不给我盛。我就围着锅,刘妈给了我一点儿,我觉得虽不难吃,但也不算好吃,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。

此时,我们的房客们都参军或者参加战时服务去了。恰好,家里又来了两位亲戚,一位是江南才女,很

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,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。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,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,但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。抗战开始,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,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,因此他们就需要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。1938年元旦未到,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出血死在旅途中,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。以后熊婆婆自主主持慈幼院,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。

另一位是陈八叔,妈妈的同乡、好友陈蕙君的堂弟。周家和陈家是世交,陈八叔年轻,当时三十来岁,清华大学毕业,是学电的,在九龙工作。现在九龙吃紧,他当然也来了。日军攻下九龙后,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。开战后,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,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,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了。兵荒马乱,没有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,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。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子放在门下,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,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。

那天中午,大家围在桌前吃饭,忽然一声巨响,天也黑了,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。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。门开了,天也亮了,声音也没了。大家正惊愣着,袁妈跑到饭厅来,看见大小都好无损,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了。大家跑到旁边一看,那空地地基上有一堆土,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,还有黑的弹片,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避的。大家都连声说“好险”“万幸”。